

# 中国 - 弱势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里程碑： 《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述评\*

梁新军

## 引 言

宋炳辉教授的论著《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近日出版。此书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深入耕耘的结果，它不仅填补了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国 - 弱势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空白，在整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也堪称优秀之作。本文拟归纳此书的主要内容，梳理其核心观点，阐释其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意义，并就其存在的问题做出探讨。

### 一、《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的主要内容

《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把东欧文学作为弱势民族文学的典型代表，以其为主要分析对象，探讨了其在中国的译介、影响及中国主体对其的接受过程。本书绪论部分交代了研究背景、研究问题、课题史，解释了重要概念，并就具体论题的展开方式做了陈述。作者采用历史叙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把全书大致分成两块：一是总

\* 本文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为201601055。

体的历史描述，如清末民初东欧文学的译介，二是具体的个案探讨，如裴多菲诗歌的汉译与影响。作者在第十章具体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东欧文学的研究情况。第十二章作者对全文做了结论性的分析与归纳，指出了以东欧文学为中心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外文学关系中的地位与功能。

具体来看，本书第一章“中外文学关系视域中的文学东欧”介绍了把东欧文学视为一个整体的理由。作者认为东欧各国在地理上相邻、历史经验上相似、文化特征上相近，文学上也有一定共性，这些都是可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客观理由。其次，从研究主体的立场看，对民族文学关系的讨论，大抵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一个整体性的民族文学的存在，这是探讨民族文学关系的起点。另外，晚清民初及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把东欧文学视为“弱小民族文学”或“被损害民族文学”的重要一部分，即把其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东欧文学作为弱势民族文学的典型代表，其被视为相对统一的文学共同体，既有客观的依据，也有特定历史境遇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观认定。

第二章“清末民初东欧文学汉译的滥觞”主要介绍了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开端，李石曾译的波兰剧作家廖亢夫的话剧《夜未央》开启了东欧文学汉译的先河。周氏兄弟在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包含了不少东欧文学作品。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十多年间，以东欧文学为代表的弱小民族文学开始被有意识地提倡与译介，周氏兄弟正是重要的提倡者和译介者，他们的译介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章介绍了“五四”时期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是二十世纪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第一次高峰，周氏兄弟在这一时期依然是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茅盾是继之而起的倡导者和翻译大家，他不仅开创了中东欧文学译介的整体格局，而且成果多、影响大。诗人朱湘在这一时期翻译了罗马尼亚的诗歌，开创了罗马尼亚诗歌汉译的先河。文学期刊方面，最关注弱小民族文学的无疑是《新青年》和《小说月报》，尤其是茅盾主编时期的《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

学旬刊》也在译介弱小民族文学方面贡献甚多。这一时期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者还有郑振铎、刘半农、冰心、王统照、许地山、赵景深等。

第四章介绍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东欧文学的译介情况。作者认为这个时期中东欧文学在译介数量及规模上都有重要进展。茅盾、巴金、王鲁彦、孙用、钟宪民等一批作家翻译家在这个时期为中东欧文学的译介做出了重要贡献。茅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延续了上一时期的特点：数量多、影响大。一些重要文学期刊如《文学》、《矛盾》等以专号形式推出了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专刊。巴金所译的戏剧《夜未央》与钟宪民所译的长篇小说《玛尔达》在当时及之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巴金译的《夜未央》不仅被女演员赵慧深改编成了《自由魂》多幕剧，于多地上演，剧本也于1938年出版。

第五章对新中国成立后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做了历时性描述。作者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国文学翻译整体上被纳入到了民族文学建构的规划中，在方针政策上体现为对俄苏文学的全面译介、对欧美文学的选择性译介、对东欧文学及亚非拉文学的大量译介。对外国文学的这种意识形态筛选，在不同阶段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有调整。如从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对苏联和东欧文学的译介明显减少，对亚非拉文学的译介开始增加。文革期间，外国文学的译介全面陷于停滞。新时期后，对外国文学的译介重又蓬勃展开。这一时期世界化和西方化再次成为社会变革的目标，“走向世界”的现代化叙事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主流话语。70年代末80年代初，弱势民族文学整体上还是作为苏联文学和欧美文学的补充，译介实践主要延续五六十年代的传统，至80年代中后期，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开始出现新的内容，在西方获得重大影响的拉美“爆炸文学”及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开始被有意识地引入。

第六、七、八、十一章，作者列举了中国—弱势民族文学关系史上几个重要的外国作家，对其作品的汉译情况做了描述与分析，展现

了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译介与传播的生动图景。第九章，作者对弱势民族文学汉译的重要语言世界语做了专门分析，认为以世界语为中介语的弱势民族文学译介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有特殊意义，它不仅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弱势民族文学资源，而且某种程度上建构了现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体意识。作为世界语运动的一种特殊方式，以世界语为中介语的弱势民族文学译介本身即是追求世界大同的一种具体方式。第十章中作者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东欧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情况，对东欧文学研究的特点、主要成果及研究视野的开拓与方法论的革新等做了简要描述。

第十二章作者整体分析了以东欧文学为中心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外文学关系中的地位与意义。在一百多年的外国文学汉译史中，对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始终处于对强势民族文学译介的夹缝中，它在现代翻译文学系统中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尽管不可否认，有个别突出的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弱势民族文学在汉语中的存在是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它在多数情况下都与强势民族文学一起建构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多元谱系，二者不断冲突砥砺，各自发挥着不同但都必不可少的文化文学功能。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不仅强化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意识，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 二、《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的不足之处

《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一书尽管具有填补空白的开创性，取得了极富意义的学术实绩，但在内容安排及结构设计上仍存在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首先，此书的一些章节明显游离了全书的论题。按照作者在绪论中的设想，此书在结构上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对百多年来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做整体描述，二是对其中的典型个案做具体探讨。这本来

是相当科学的设计,但作者在实际展开中塞入了一些游离主题的章节,如第七章的第三节“东德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此节探讨的布莱希特是毫无疑问的德国人,尽管冷战时期勉强可把他的作品归入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文学”,但把一个正宗德国作家的作品视为“弱势民族文学”,无论哪方面看都比较牵强。第十章的内容也不大合乎全书的中心论题。按照作者在绪论中的多次陈述,此书的论题是以东欧文学为中心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影响与接受,但第十章的内容却是中国学者对东欧文学的研究情况的描述,尤其是第二、三、四节。“研究”在何种意义上能被归入“译介”、“影响”或“接受”的范畴,作者并没有论证,而且从内容看,第三四节也纯粹是汉语学界的东欧文学研究史,性质上属于学术史,与东欧文学的译介和影响研究几乎无关。第八章的第五节也游离了全书及第八章的主题。此节实际上探讨了昆德拉戏剧作品《雅克和他的主人》与狄德罗的《命定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的文本关系,完全未涉及昆德拉作品的汉译及其影响。

此书在某些章节上也存在“文不对题”的现象。第十一章的“泰戈尔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一章,从标题设定看,作者应关注泰戈尔作品的汉译及其影响,但通观全章,作者并未介绍泰戈尔作品的汉译。第五章的第三节“后30年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同样从题目看,作者应介绍新时期后大约三十年的弱势民族文学译介,但实际的内容只包含了八十年代的情况,并未涉及之后的情形。第十二章第五节的“东欧文学的中国意义”,作者本应正面回应东欧文学对中国的意义这一核心问题,但实际论述中却明显偏离了。此节的主要内容如下:(一)中国-东欧间共同的社会及思想背景;(二)中国-东欧文学关系的两个层面(事实联系层面和逻辑关系层面);(三)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动力(中国主体有意识的倡导);(四)东欧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程度与其译介数量不成正比。作者似乎把这四方面内容视为东欧文学的中国意义了,而从内容看,这四方面明显很难归入东欧文学之

于中国的意义范畴。

此书在研究对象的设定上也存在不统一之处。从绪论部分看，作者反复几次申述所要探讨的问题，如“本书选择现代中国视域中最具典型性的弱势民族文学，即东欧诸国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作为主要论述对象”（宋炳辉，2017：2）、“本书中的展开论述，……力图将被中西文学关系的强大话语所遮蔽了的中国与弱势民族文学关系为考察对象，检点20世纪中国对于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具体过程及其成果，厘清其在各个时期的译介背景和译介内容”（宋炳辉，2017：15）、“本书将考察弱势民族文学进入中国的时间和被接受的具体情况，同时结合其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情形，通过与西方强势文学的译介和接受语境的对照，考察中国文学主体的内在反应”（宋炳辉，2017：15）。以上这三次问题表述，明显存在着研究对象的不统一。第一次问题表述中的主要考察对象是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第二次和第三次则成了中国与弱势民族文学的关系。按照作者在文中的界定，弱势民族文学指称以下三种对象：欧洲弱势民族文学；除日本外的其他亚洲国家文学；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被殖民地区的文学。

（宋炳辉，2017：12—13）东欧文学只是弱势民族文学中的一种，并非全部，作者在这里反复申述的研究对象在范围上明显不统一。实际上在全书各章节的展开中，作者的研究对象始终在个案意义上的东欧文学与整体意义上的弱势民族文学之间来回切换。第二章的标题是“清末民初东欧文学汉译的滥觞”，第三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第四章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东欧文学的译介”，第五章是“共和国时期弱势民族文学译介与民族文化建构”。作者的这种在研究对象上的摇摆不定，一方面固然可能因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一方面也可能是作者研究视域的不确定及研究逻辑上的松散。实际上，以典型性个案切入对整体的研究，逻辑上并无问题，这是一种相当常见的研究手段，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经常使用。但作者在书中的摇摆却显示了对这种研究方法的不信任，及对庞大的整体

研究的无力驾驭。

在一些内容细节上此书也存在一些矛盾。如作者在论述 30 年代弱小民族文学译介时曾认为“正是针对 30 年代政治文化局势的转变，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及其纠缠复杂形势，鲁迅和茅盾对弱小民族文学译介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另一态度和实践方法”（宋炳辉，2017：78），这“另一种态度和实践方法”如作者所说，是“这一时期，他们几乎停止了这一方面内容的译介，而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俄苏和日本的左翼文学”（宋炳辉，2017：78）。但作者在其他地方又披露了另一个事实：1934 年 5 月《文学》杂志推出了“弱小民族文学专号”，茅盾作为杂志的实际组织者及编辑在这期专号上发表了多达六篇翻译小说，并撰写了一篇研究文章（宋炳辉，2017：67）。这一事实与上述所谓的“他们几乎停止了这一方面内容的译介”的判断无疑是矛盾的。

此书在基本的研究立场上似乎也存在困惑。作者在第十二章的第三节写道：“即使是‘交流史’的史述方式，也同样难以逃避研究者的主体文化立场。……回到‘中外文学交流/关系史’这个名称上，其中的‘中’与‘外’二元其实并不对等，而是一种‘以一一对多’的关系。这种不对等就表明研究者无可回避的中国文化的立场，即他无法脱离中国文化学术语境，同时也必须考虑研究者自身的学术期待和社会效应，必须以主体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那种貌似或者自称客观超越的立场其实并不存在。”（宋炳辉，2017：232）作者在这里的立场阐述固然无可指摘，研究者的学术工作很多情况下的确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他无法脱离某一学术语境甚至是社会历史语境的限制，他的学术实践很大程度上也的确应该立足某种现实需要（不管是社会的还是学术自身的），以现实需要为出发点和旨归。但这种“功利性”的研究任务及价值诉求，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不应恪守客观中立的学术原则。实际上，“客观中立”并不是一种学术“立场”，而是一种研究实践的操作规范，一种基本的学术原则，它的目的是引导研究者最大程度地获取真理。作者把研究任务与研究价值目标，与

研究实践原则对立起来，明显误解了“客观超越”的真正内涵。不回避研究主体的文化立足点，与恪守客观中立的实践原则实际上并无矛盾。“客观中立”只是规范研究者该“怎么做”的，不是指导研究者“做什么”和“为什么做”的。

此书的核心问题——译介以东欧文学为代表的弱势民族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作用，作者始终未给予明确的回应。在最后一章的部分段落中作者似乎做了不太系统的间接表述，但其观点颇为矛盾。作者一方面认为“文学翻译本身就是中国现代主体文化和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途径，……是中国现代民族建构及‘现代人’想象或者幻象的建构中一种强有力的中介”（宋炳辉，2017：239），一方面又认为“……民族意识总可以找到其存在的理由，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决定和影响对于外国文学的译介和接受情形”（宋炳辉，2017：243）。作者在这里似乎表达了两层自相矛盾的意思：（一）外国文学的译介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中国现代民族意识；（二）中国现代民族意识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制约了外国文学译介。这两种表面上看似辩证实则自相矛盾的表述也许的确是弱势民族文学译介在现代中国历史情境中的复杂性使然，但似乎也隐约表明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看法。

### 三、《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价值与方法论意义

《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一书虽然尚存一些有待改善的问题，但瑕不掩瑜，其客观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如本文引言中所说，此书不仅填补了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国—弱势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空白，在整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也堪称优秀之作。首先，此书基本上勾勒了一百多年来以东欧文学为中心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程，系统展现了东欧文学的百年汉译图景，并就其中的典型



个案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史上这无疑是在填补空白的开创性贡献，有不可取代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没有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梳理和有效建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其次，在一些重要个案上此书也做了深入探讨，对典型弱势民族文学作品之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意义做了精彩分析，如对裴多菲《自由与爱情》多个汉译本的研究、对昆德拉作品汉译及其影响的研究。对世界语作为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中介语的研究，作者也花了相当大的功夫，对其特殊的文化意义与文学功能做了深入揭示。第三，此书不仅彰显了被占据主流地位的中西文学关系遮蔽了的中国-弱势民族文学关系的复杂情形，而且有效论证了被中西文学关系的强大学术话语遮蔽了的中国-弱势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学术意义，指出了20世纪不同历史时期对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对中国现代主体而言均有不可忽视的功能：弱势民族文学对中国主体不仅有文化情感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慰藉作用，更有效建构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体意识，在文学实践上也发挥了不逊于强势民族文学的创生性功能。

此书在方法论上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也有重要启示。首先，此书有鲜明而强烈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尽管在有些章节被短暂搁置，但整体上贯穿全书始终，引领着各个章节的有序展开。其次，在基本的结构设计上此书也相当严谨，绪论部分、整体的历史描述部分、个案分析部分、总结陈述部分，作者安排得井井有条，各个部分的核心内容都得到了有效呈现。第三，不同于其他一些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著作，此书在弱势民族文学与中国主体的关系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对弱势民族文学之于中国文化文学的创生性功能做了深入揭示，这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深入拓展而言无疑有积极贡献。第四，作者在此书中运用了丰富的一手资料文献，对其做了科学的分析，此种以一手资料文献为根据的研究方法，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无疑有正面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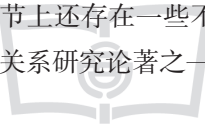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结 语  
The Commercial Press

《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一书，客观上填补了中外学界对于中国 - 弱势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空白，在学术内容及方法上均有一定创新价值。其无疑属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优秀之作。总结而言，此书很好地揭示了一百多年来以东欧文学为中心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对其中的典型作家作品之于中国的特殊作用做了深入分析，揭示了弱势民族文学在建构现代民族主体意识、启发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方面的重要贡献。此书在问题意识、章节结构设计、运用一手文献资料等方面也有积极的学术意义。尽管在一些结构问题及内容细节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此书堪为近年来优秀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论著之一。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